

为科技兴国而奋力工作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钱学森

各位领导,同志们:

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首都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科技工作者自己的统一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今天,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庆祝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此时刻,我们追怀在中国科协历史上曾经辛勤耕耘、现已去世的李四光、梁希、侯德榜、竺可桢、吴有训、丁西林、范长江、丁颖、黄家驷、华罗庚、杨石先、刘述周、王顺桐等同志,我们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怀念。

中国科协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

我们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对中国科技社团发展的历史作一个回顾。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仁人志士,其中也包括一大批爱国的科技工作者,曾经进行了长期的英勇卓绝的斗争。早在清末戊戌维新时期,中国有近代意义的各类学术团体就诞生了,其中包括各类科学技术团体。梁启超在当时发表的《论学会》一文中说:“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各类学会的兴起,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最早的一批学会,如中国农学会、中国医学会、中国药学会,就是在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下成立的。以后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运动,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三十年代以来的抗日战争,都推动了中国科技社会团体的发展。影响较大的,如辛亥革命后1912年成立的中国工程师会,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抗日战争时期分别在延安和重庆成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有影响的全国性科技学术团体已有30多个。这些科技学术团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成立的。它们和全国其他进步学术团体一道,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在推动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进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反对封建、愚昧、腐朽的旧专制制度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了节节胜利,新中国的曙光即在眼前。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宏扬才智、强国富民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科技团体的活动,团结全国科技工作者万众一心地为建

设新中国而奋斗,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四个团体联合发起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选出15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筹建新中国的大业。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首都北京正式召开。来自全国的四百余名科技工作者,包括海外华裔学者的代表欢聚一堂,为促进新中国科技事业共商宏图。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代表。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两大组织。至此,中国科技工作者把自己的组织联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国家的科技振兴为己任,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成立以后,一直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德高望重的吴玉章同志担任了“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两大组织的名誉主席。著名科学家梁希、李四光、侯德榜、曾昭抡、吴有训、严济慈、竺可桢、丁西林、茅以升等担任了“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的领导职务,并具体组织了各项学术和科普活动。“全国科联”组织科技工作者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重大政治活动,投入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促进各学会学术活动的开展,编辑出版了94种学术刊物,并同44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团体进行了经常的刊物交换,开展了对外的学术交流,在提高新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科普”面向人民群众,发展了地方科普组织,运用科普演讲、科教电影、科普展览、图片幻灯等多种形式,向全国城乡群众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为提高全国人民科学文化水平做出了贡献。1956年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极大地调动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同时推动了“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我国科技工作者既关心科学技术的提高,又关心科学技术的普及,这是在一个科技、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要求能够较快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为了促进提高和普及的结合,1958年9月,聂荣臻同志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主持召开了“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两大组织的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科技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选举李四光为主席。以后又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从1958年中国科协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八年间,虽然也受到“左”的干扰,但是总的说来,这一时期中国科协的工作是发展的。全国性学会由30多个发展到53个。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地区、县、旗相继建立了地方科协组织。各地学术、科普活动场所和图书期刊出版事业有了发展。在国务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和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大大激发了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才能,中国科协的各级组织、各全国性学会和科普学会也进一步活跃,围绕国家建设中的重大课题开展学术活动,深入实际下乡下厂开展技术服务工作,召开了北京科学讨论会等比较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可惜的是这一势头由于十年动乱没有能够持续发展下去。

中国科协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兴衰命运紧密联系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浩劫,中国科协自然不能幸免。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实行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人民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科协也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回顾中国科协的发展历程,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科协的成立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人民的进步需要和科技事业的社会

化发展需要产生了中国科协,它又在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复兴中得到发展。中国科协与我们蒸蒸日上的祖国一样,它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为科技兴国服务的十年

中国老一辈的科技工作者经历了科学救国的历程,现在又同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一起步入了科技兴国的历史时期。我们所说的科技兴国,就是全社会都要重视科学技术工作,把科学技术放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促进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事业的现代化,达到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战略目标。这一思想不是今天才提出的,早在十年之前,在孕育和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的时期就提出来了。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正是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的邓小平同志。请看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一段讲话吧: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可以说是关于科技兴国的最好概括和最完善的表达。党的十三大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正是这一思想的发展。十年来,我们中国科协及所属学术团体和科普团体的工作正是遵循这一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前进和发展的。

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全社会的事业。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和领导,是发展科学技术的最根本的前提。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除了要发挥各级政府组织、科技单位和教学组织的作用外,还应当重视发挥科技群众团体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组织所不能代替的。

发展科学技术需要科技工作者个人忘我的专心致志的劳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光有这还不够的,还必须有活跃的学术思想环境,有信息广阔的富有生气的学术交流。在一个沉闷孤独的学术环境中,是难以取得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的。十年来,中国科协及所属全国性学术团体的一项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活跃学术思想,积极推动和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我们围绕当代科学前沿课题进行内容广泛的学术探讨,尽可能看远一些,超前一些,想深一些,为我国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道路。我们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的重大课题,开展多学科、综合性、战略性的学术研讨,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献计献策。我们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在新的生长点上推动了交叉和边缘学科的发展。目前中国科协所属的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包括理工农医和部分交叉学科,已发展到146个,全国和地方学会会员400多万人;每年举办国内外重点学术活动2000多次,编辑出版各类学术期刊818种,学术论著1000种;先后成为162个国际学术组织的团体会员,并与336个国际性学术团体建立了学术联系,发展了友好往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中国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也包括中国科技社团的辛勤劳动。

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能否取得良好的发展,根本在于劳动者的素质和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科普工作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方面有重大意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上不可能事事从头做起,因而在全国人民中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广大劳动者接受新技术的能力,从而能够较快地掌握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科普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十年来,中国科协各级组织及所属学术团体和科普团

体的科普工作有重大发展。目前全国共有基层科普协会46,560个,85%的乡镇建立了科普协会,共有会员416万人。全年共出版各类科普图书1500多种,科普报刊1100多种,举办包括青少年科技活动在内的各类科普活动200多万次。各地科普宣传、展览、教学设施也有很大发展。一个在各级党政领导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推动下,以广大城乡专业科技工作者、各行各业的科技能手和乡土人才为骨干,上联各全国性学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各级技术推广机构,下联广大企业、学校、农户的科普网络正在形成,并且已经和正在对开展科普宣传、传播科技知识、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广大城乡群众和青少年的科学文化水平等方面发挥作用。科普工作是面向全社会的群众面很广的工作,必须主要依靠社会力量来进行,而中国科协及其所属学术团体和科普团体正是推动我国科普工作的重要社会力量。

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给我国科技社会团体打开了新的境界。在旧的科技体制下,从科技攻关到产品开发,都是依靠科研单位、生产企业自身的力量完成的,需要协作的都要经过行政管理体系条条进行。改革和开放冲破了自上而下的纵向科研、生产、技术管理体制和封闭式的科研攻关方法,依靠科技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和社会化的科技服务工作,大大加快了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的进程。中国科协的各级组织及所属学术团体和科普团体,一开始就是跨部门、跨地区甚至是跨行业的横向智力组织,因此最便于开展横向联系和科技决策咨询服务等工作。在原有的学术、科普组织的基础上,中国科协正在形成如下几类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帮助各类专业科技人员进行知识更新的继续教育体系;促进大中型企业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厂矿科协体系;为中小型企业 and 乡镇企业提供科技咨询和服务的体系;以推广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或技术协会体系。上述几类体系中以厂矿科协和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发展较快,影响较大。目前全国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建立了厂矿科协,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发展到八万多个,它们在推动城乡科技进步,加速科技成果向商品的转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技术是建设新世界的革命力量。在现代物质文明建设中,科学技术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科学技术也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作为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又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中国科技工作者承担着既要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又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任务。中国科协的各级组织及所属学术团体和科普团体,在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一直把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间倡导发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在各项学术、科普活动中重视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的探讨和传播。通过各种学术评论、纪念表彰、思想研讨等活动,促进“坚持真理,诚实劳动,亲贤爱才,密切合作”的科学道德的成长。面向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分层次有所侧重地进行。对领导干部和组织管理干部主要是进行现代管理和科学决策知识的传输;对广大城乡群众,主要是提倡科学生产和文明生活,进行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宣传;对广大青少年,主要是进行科学理想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提倡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促进科学世界观的形成。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和科普工作进行,寓思想教育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之中,并且同培养讲理想、讲道德、讲文化、讲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结合起来。科技工作者要身体力行,首先从自我做起,起表率作用。

中国科技工作者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自觉建设者,党和国家对科技工作者寄予殷切的期

望。在加强党和政府同科技工作者联系中,中国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自己的组织,应当更好地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组织科技工作者学习党的有关方针和政策,发动科技工作者对国家发展中与科技有关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加社会协商对话活动,反映科技工作者的利益、呼声和要求,做好对科技工作者的各项有关服务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纽带桥梁工作的重要方面。这一工作做好了,不仅有利于增进党政领导同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信任和理解,进一步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能够加强科技群众团体自身的凝聚力,使科协更好地发挥“科技工作者之家”的作用。这也是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年各级科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总的看来,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是不相适应的,还需继续努力。

为科技兴国服务的十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在科协系统中贯彻和落实的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指明了科协工作的方向。改革和开放方针,开拓了科学工作的领域。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推动了科协工作向前发展。在为科技兴国服务的十年中,中国科协开过两次代表大会。一是1980年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组成了以周培源为主席的第十二届委员会。一是1986年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都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召开的,对动员科技工作者团结奋斗,投身改革,为四化大业顽强拼搏,作出了贡献。一大批对科协工作有杰出贡献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荣誉称号:周培源、严济慈、茅以升被授予名誉主席;王淦昌、许杰、苏步青、汪德昭、沈鸿、沈其益、陈世骧、杨显东、金善宝、高士其、谈家桢、袁翰青、黄汲清、董纯才、裴丽生、王顺桐被授予荣誉委员,这标志着中国科协历史的前进。

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是中国十亿人民意志的凝结点。中国科技工作者任重道远。

面临世纪之交的思考

我们即将进入本世纪最后的十年,面临世纪之交,全世界都在思考。一个席卷全球改革浪潮正在震荡着世界。无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寻求对策,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进行改革和调整,从而正在形成新的世界格局。引起这场全球性改革浪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为深刻的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人们倾向于把引起人类思想巨大变革的两本科学巨著,即1543年在欧洲出版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论》,作为近代科学的起点。从那时起到现在,四百多年过去了,近代科学技术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开始,可以称之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开创时期。培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这些科学巨人是近代科学的奠基人。第二个时期,从十八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开始到本世纪初,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恩格斯称之为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的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而且力、热、光、电、化、生、地等一系列经典科学理论都发展成熟了,近代技术体系也已基本形成。这就给二十世纪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时期,从本世纪初到现在,可称之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时期。人们不仅可以把物质深处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而且进入到太阳系空间。同时,社会物质财富也有了成百

倍成千倍的增长。遗憾的是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不只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财富,而且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不仅出现了遍及全球的生态环境破坏,而且竞相研制出威力强大的杀人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是军备竞赛还没有停止。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世界相互对峙的两大军事强国武库中存放的核武器,不仅可以毁灭人类几次,甚至几十次。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在一场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这种认识正在给世界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不要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销毁中程核武器条约的签订和实施会终止核军备竞赛,竞相发展更先进的军事武器以夺取军事优势,仍然是他们的重要国策。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也确实出现了重大的战略调整。面向未来的战略优势不能只着眼于军事,而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中间,科技和教育将成为影响发展的关键因素。人们期望二十一世纪成为和平和发展的世纪。这种前景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的。但是,也必须注意到,竞争决不会停止,它将更加激烈,特别是在经济和科技的竞争上,这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夺取胜利!

展望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人们有理由作如下期待:

它将是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居于世界科学技术前列的国家,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于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争夺上,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领域将出现新的重大突破。新的生产技术、新的生物品种、新的物质合成、新的信息、能源、交通结构以及对宇宙自然现象的新的认识,将对世界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将随之发生前所未有的新的变革。

它将是同经济发展高度结合的科学技术。高技术研究开发和高技术产业将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主要因素,并且将对传统产业带来重大影响。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依靠程度大大增加了。商品构成中包括的技术因素,技术发明中包括的科学因素,也大为密集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工作的老的划分必将改变,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等几个领域之间,将出现交叉、叠合。由科技发现转化为商品的周期将大大缩短。

它将是全球性相互依存的科学技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是在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许多重大项目的技术密集度越来越高,加上技术的发展日益多元化,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用独自的力量来解决竞争和发展中的所有技术问题。一些影响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已具有全球性质。因而建立一国独立完整的科技体系的思想已经过时。科学技术的国际分工和合作将日益深化。世界将生活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的环境中。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能否取得较快地进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吸收程度和参与程度。

它将是科技—经济—社会—环境日益协调发展的科学技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准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水平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环境、教育、文化的协调发展上。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社会公平、教育文化、医疗共享,以反消除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对社会和心理的危害上。人们将会努力使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得到平行发展。

它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哲学相统一的科学技术。世界经济科技竞争将在一定意义上转化为经营思想、发展战略和科学决策的竞争。谁在哲学思想、领导艺术和科学决策上占优势,谁就占领了战略的制高点,就会赢得竞争的胜利。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理性的时代会

在人类的进步发展中产生。在这个时代中，不仅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且人类的高尚思想追求将影响世界。

当我们展望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前景的时候，必须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现实出发，考虑如何使我们科协的工作与时代的更替相适应。我们国家正处在深刻的改革和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是我们时代的主题，我们科协的工作必须融汇在这个总的主题之中。我们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作为拥有全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部分交叉学科众多学者专家的学会联合体，我们的很多工作应当是超前性的，特别是有关未来发展的学术探讨，应当对国家决策研究提供有思想价值的见解。

面临世纪之交的时代更替，中国科协应当有些什么思考呢？

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推进科协系统的改革。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给我们科协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应当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理顺与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好组织系统建设和工作发展的机制问题，使科协的各级组织及所属学术团体和科普团体，能够成为适应未来科技大发展形势要求、充满时代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群众团体。

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地为促进科技进步服务。具有强烈时代责任感和紧迫感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应当抓紧时机，奋起直追，努力缩短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中国科协的各级组织及所属学术团体应当把大力推进学术交流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思想要进一步活跃，交流要进一步开放。要坚持和发扬科技工作中的民主精神。要重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学术研讨，加强科技发展中的规律、方法、战略、重点、方针、政策的理论研究，以推动科技实践的发展。

我们应当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把它提到关系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来对待。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不应只是扫除文盲，而且应当扫除科盲，并且应当把这项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建设文明国家、文明社会，科普工作是一项基本工作。中国科协及其所属学术团体和科普团体应当协助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全国科普工作的战略规划，并在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们应当更好地促进科技与经济和文化的结合。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振兴国民经济。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为目标，在厂矿企业科技人员中开展的“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较好形式，要不断发展。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或技术协会的兴起，正在形成现代科技通向农村的重要通道，要进一步巩固提高。随着改革的深化，企业的文化意识和职工的文化素质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克服已经出现的某种重经济轻文化的倾向，是当前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避免片面追求短期经济行为的重要方面。从长远的观点看，也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当大力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当代世界的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又集中表现在人才的竞争上。希望在青年。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人才培养必须从今天的青少年抓起。我们要支持和协同教育部门大力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使科技人才幼苗不断涌现。我们要充分发挥科协和学会在促进人才成长和参与社会教育中的作用，促进各学科富有创造才华的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我们要促进社会各方面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更加重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工作，为形成我国结构合理、学科配套、人数众多的科技队伍的长远建设，倾注力量。

我们应当大力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现代科学本身是统一的。对自然科学的内在规律和外在条件的研究就介入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离开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就形成不了跟上时代发展要求的有真实价值的学术思想。自然科学工作者应当学习必要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作两科联盟的促进派。

科技兴国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奋斗目标,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事业。中国科技工作者及其组织应当长期地勤奋工作,为之努力奋斗。

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在美国举行

1988年8月5日至8日,在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举行了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5th ICHSC)。加州大学教授、为公研究院主席兼董事长程贞一从1978年开始就计划组织筹备这次会议。会议由何丙郁、柯俊、李约瑟、席文、王玲、席泽宗和蕤内清组成国际顾问委员会,陈民熙、李佩珊、王锦光、刘广定、李倍始、何冠彪、杨玉峰、中山茂、全相运、洪天赐、兰丽容、程贞一、黄兴宗和钱存训组成国际组织委员会,程贞一、林绍基任当地组织委员会正、副主席。

这次会议报名的代表有197人,实到100余人,来自美、英、法、西德、比利时、瑞典、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南朝鲜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提交大会的论文或摘要有182篇,包括15个领域和方面:数学史24篇,天文学史20篇,物理学史36篇,化学史8篇,医学史9篇,生物学和农学史9篇,地学史16篇,金属学史7篇,语言、哲学与科学史14篇,关于二次大战中日本细菌战5篇,近、现代科技史13篇,中外科技交流史8篇,科技人物传记8篇,少数民族科技史3篇。大会开幕式由程贞一主持,加州大学副校长H·K·Ticho致欢迎词,李约瑟作录相讲话,王玲致开幕词。大会的邀请报告有4篇:鲁桂珍和李约瑟“中国法医学史”、席文“中国传统医学语言的翻译”、何丙郁“子平推命术”和柯俊“冶金技术与中国文化”。其余论文都在各分组会上宣读和讨论。

鉴于李约瑟、鲁桂珍和王玲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特殊贡献,为公研究院授予他们三人以首次为公奖金和奖状。

出席这次会议的台湾代表有11人,他们是: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国伟(台湾科学史委员会现任主席)、近代史研究所张瑞德、台湾大学化学系刘广定(台湾科学史委员会前任主席)、图书馆学系潘美月、国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吕彼德、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程石泉、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孙方铎、历史研究所傅大为和黄一农、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系洪万生、淡江大学历史系叶鸿瀛。会议期间,大陆数学界同仁和李国伟、刘广定、傅大为、洪万生以及法国马若安等还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聚会,深入探讨有关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等问题。海峡两岸学者都充分表达了进行交流和合作的热烈愿望。

据悉,第六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定于1990年在英国剑桥举行,以表示对著名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九十寿辰的祝贺。

(于生)